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九二期 ——
(二〇〇六年四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4b)

【回首四五】	三十年前的峥嵘岁月——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	刘天成
【史海钩沉】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	霞 飞
【史实澄清】	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并非“四人帮”授意之作	王忠人·江燕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回首四五】

三十年前的峥嵘岁月——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

• 刘天成 •

“天安门广场出事了！”

这是我在办公室接到妻子的电话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时间是1976年4月5日下午三点。

“上午我送日本客人去机场，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路被人群堵住了。广场上的花圈全没了，到处都是愤怒的人群。从机场回来，广场的人更多了，大概有二十多万人，公安局的车都被烧了，要出大事了！”

我的直觉反映：“火山终于爆发了！”

◇ 文革转折

文化大革命最后的转折点是从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邓小平复出后，反对“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整顿，在经济建设上获得了较大成功，同时也使全国人民

的思想得到了一次空前的解放。人们在那段时间里，切身体验到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复苏，也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在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决定。由于整顿唤醒了人们长期受到压抑的理性思考，促使人民群众朦胧地感觉到了中国未来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批邓越猛烈，不满和反抗就越强。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邓小平复出那两年在人们心中建立起的威望，远远超过了他以前大半生在人们心中的威望。他代表了全国人民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和过稳定生活的愿望，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果毛泽东在1966年打倒邓小平是轻而易举的话，那么到了1975年、1976年再想重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但未能实现毛泽东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目的，相反动摇了“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中的根基。

周恩来的亲民形象使他在“文革”前就有着仅次于毛泽东的威望。“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毛泽东的威望从顶峰开始下滑，而其夫人江青的所作所为更给他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相反，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及他带病出席四届人大，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处于“文革”苦难中的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周恩来在许多人尤其是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心目中，其威望甚至超过了毛泽东。

◇ 痛悼总理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步，离开了人世。噩耗传出，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巨星陨落，举世震惊；江河动容，山川失色！我为失去这样好的总理而非常难过，同时又为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竟然没有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后来得知，毛泽东在12日对汪东兴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

周恩来遗体告别只设在北京医院后院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停尸间，连一个省军级去世干部的灵堂都不如。据说北京卫戍司令吴忠曾为此气愤地质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长叹一声，说：“在哪里向总理遗体告别，市委提出了几个方案，上面只让在这里进行，我们只能服从中央的决定，对不起总理他老人家了。”治丧委员会向全国下达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规定（不许开追悼会，不许设灵堂，不许戴黑纱，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等），更是激起广大人民极大不满。北京的数十万民众，在寒风中肃立街头向周恩来的灵车作最后的道别，形成了“十里长街相送”的悲壮场面。人们既是哭总理，哭国家，也是哭自己，心中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怒火燃烧。“山雨欲来风满楼”，“火山”处于爆发的前夜。

从1月到4月，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各种活动有增无减。当时人们表达怀念的一种方式收集、悬挂总理的照片，有的人家甚至用周总理的照片取代毛主席的照片。后来流传最广的一张总理晚年坐在沙发上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来》，是意大利著名摄影记者焦尔乔·洛迪于1973年总理生病时拍照的，没在中国发表过。当年他通过意大利驻华使馆向周总理赠送此照片，但不知什么原因总理没收到。这幅照片最先刊登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1974年，该照片荣获美国著名的新闻照片奖——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认识世界奖”。那张照片后来在中国流传，和我有一些关系。

1976年初，我的一个好朋友去意大利，在米兰参观一个摄影展时看到了总理这张照片。她设法复制了一张，回来拿给我看。我看后认为十分珍贵，一是这张照片拍得太好了，逼真地刻画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采光、构图都有独到之处，巧妙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在性格。二是新华社颁布的总理遗照中没有这张照片，有可能国内都没有。如果能翻拍传播出去，无疑对

当时人民自发悼念总理的活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和推动。我借了回来。我妹夫张平当时在文物出版社搞摄影工作，文物出版社刚进口了一台全国唯一的光谱分析印刷机，他拿着照片到文物出版社印制了二百份24寸的照片。我们又通过各种关系，把这些照片送给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王震、余秋里等领导人，送给亲戚、朋友。这是当年最珍贵的礼物，据说邓颖超生前非常喜爱。后来这版本流传全国，总印数共达9000万张。

◇ 反击批周

“四人帮”对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对死去的周恩来仍不放过。1976年3月25日，上海《文汇报》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一文中，竟然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恶毒提法。谁都知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邓小平的代名词，“党内那个走资派”不就是指周恩来吗？民众终于忍无可忍了。

4月5日清明节前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

南京的群众首先走上街头，声讨《文汇报》及后台张春桥。我妻子的姐姐在南京无线电厂工作，她来电话详细谈了南京群众的抗议活动。3月28日，南京学生大游行，他们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经过市区，走到梅园。29日，南京大街小巷贴出了许多大标语：“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在火车站工人的协助下，学生把标语刷到南来北往的列车上，把烈火烧向全国。

我当时在石油化工部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政治部宣传处工作。该院设在海淀区原北京石油学院内。29日清晨，院里突然出现24条大标语，主要是声讨《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行径，也有声援南京人民的内容。那是我院下属石油机械厂的几个不满“四人帮”的青年工人干的。该厂原属北京石油学院，文革中石油学院迁到胜利油田后，石油部专用该厂安置部机关本应上山下乡的子女。因此，该厂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青年，其中大部分是干部子弟。

早晨一上班，处长王庭树让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赶快把标语的内容抄下来，报送院领导。我们在抄时，发现保卫处的人也在抄。在这些标语中，最突出的是贴在规划院大楼前的两条，一条是：“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翻案不得人心！”另一条是：“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两条标语分开来看，一条是反击邓小平，一条是怀念杨开慧，表面都无问题。但如合起来看，则有“影射江青”之嫌。当时我暗暗佩服这些小年青挺懂得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

保卫处在政治部主任指使下把这作为反革命案件上报石油部和公安局时，我们宣传处极力反对。我站出来为小青年辩护说“看不出两条标语有问题”，质问保卫处“为什么不能怀念杨开慧”？！指出保卫处“影射江青”的结论是靠推理定性。当时吵得非常激烈，惊动了院领导。

◇ 风起云涌

在这前后，北京的群众也大量涌向天安门广场，以献花圈、贴悼念诗词、发表演说等方式进行抗议。北京天安门烈士纪念碑最早出现献给周总理花圈的日子是3月19日，是朝阳区一个小学献的，花圈很快被警察没收了。25日，献花圈的人增多，并出现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想念您”的巨幅横匾。天安门立即成为北京民众关注的中心。

石油规划院申院长是个老红军，文革中历经磨难，对“四人帮”很不满，十分关注形势的发展。他让宣传处紧密关注社会动态，派人天天去天安门了解情况，拍照片，回来后写出《情况汇报》，送给院及政治部领导。处长让我们一次去两个人，我年纪最轻，又最积极，每天都去，其他人则轮流和我一起去。3月30日，一队解放军来到烈士纪念碑前献花圈，这无疑给在场的民众以巨大鼓舞。我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深知解放军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如果没有广大官兵强烈的呼声，没有上边领导的默许和支持，这些官兵是不可能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军队中也酝酿着不满的风暴。当我回来把这件事报告给领导时，激动的话都语无伦次。

31日，广场上的花圈已达上百个，诗词、悼文已明显出现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在中国人民同万恶的“四人帮”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关头，诗歌成了直接的战斗武器。如：“昔日姐已毁一商，今朝‘艳妖’舞蹁跹。”“豺狼何所惧，虎豹咱敢降。识破假马列，怒斥妖婆娘。”

4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声称：“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称天安门广场等地张贴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指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要求对已出现的大标语“全部复盖”，声称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北京市委立即开会贯彻执行。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成立。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出动。天安门广场的“便衣”开始抓人，被抓的群众已达数十人。一场生死较量开始了！

4月2日，院政治部传达了北京市委的电话通知，称“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门有反革命捣乱”，明令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不要送花圈，并说“清明节是鬼节”，“清明节送花圈是四旧”。我因为一早从家里直接去的天安门广场，不知有这个通知，回来后照往常一样，写了有关材料上报领导。

这一天，最激动人心的是出现了高达四米的巨大的花圈，是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用钢条焊制的。当大卡车把花圈拉来时，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另一引人注目的是，在烈士纪念碑上，挂着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估计是天没亮挂上去的。内容是：“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无论是坐车还是骑车经过天安门，都能远远地看到它。有一首《向总理请示》的诗，暗示“四人帮”快要垮台：“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这首诗把“四人帮”几个头目的姓连缀在一起，巧妙地运用了谐音隐喻的手法，让人心领神会，拍案叫绝。

在我把材料交给处长时，他向我传达了不让去天安门广场的有关通知。他说：“申院长讲，这一段时间处里的同志们很辛苦，了解动态的工作暂告一段。抄来的诗词、文章及有关照片全部销毁，不得外传。”处长还特意提醒我，形势很复杂，让我注意言行。

◇ 清明怒潮

4月4日清明节，正好是星期日。虽然已有通知不让去天安门广场，但由于十余天来，我天天去广场，心系广场，情系广场，甚至觉得国家的命运、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和天安门广场事态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1949年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人民自发的大规模运动。我渴望看到人民能不畏强暴坚持下去，更好奇上面的通知下来后人们抱什么态度。

那时我住在岳母家，听了我对天安门广场情况的描述，全家兴趣大增，斗志昂扬，一致决定即使挨批评受处分，也要去天安门看看。在北太平庄，唯一能到达天安门广场的22路公交站挤满了人。由于我们一行有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根本挤不上车。那时中国还没有出租车，只能坐公交车。那天公交公司也来了邪劲，22路加班车一辆接一辆。汽车一进站，就能听见售票员的喊声：“去天安门的一律免费！”哈，真是振奋人心！看见许多人戴着白花、黑纱，我们赶紧把准备好的黑纱佩戴上。至少过了十五、六辆车后，我们才挤上了车，到达天安门广场，已是中午十二点了。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清明节，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约有上百万人云集广场，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周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我和妻子做了分工，我负责拍照，她去抄诗词。长安大道南侧，广场上的花圈从烈士纪念碑摆到国旗杆下。大道北侧，天安门下的观礼台上也摆满了各种花圈。最大的花圈直径超过七米。从前门通向烈士纪念碑的路旁柏树上和人大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周围的树丛里，白花层层叠叠，一片雪白，全是民众离开广场时留下的。

在纪念碑正前方，高高地安放着周总理的巨幅画像，画像下是用大朵白花排组的大横幅“民族英魂”。再下面又是巨大横幅：“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敬爱的周总理。”广场中央有四幅巨匾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四言诗：“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我们全家在这儿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到处是诗词、悼文，人们争相抄写，朗诵。那种壮观场面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有诗为证：“清明的花圈如皎月，嫦娥感慨同悲切。清明的挽联像尖刀，忠魂挥舞断贼腰。清明的檄文放光彩，进击大旗长空摆。清明的诗歌披彩霞，革命事业露新芽。清明的歌声连广宇，国际战歌不断曲。清明的口号震乾坤，人民永将正义伸。”

诗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基层民众。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赞美这些诗词的：“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亿万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

有人在发表演说。我赶紧挤过去拍了下来。在往外挤时，发现拍照的人很多，其中不乏便衣，没准儿把我也照进去了。管他呢，谁会在乎！有生之年能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能经历如此波涛汹涌的斗争那真是三生有幸了。还有这么一篇散文诗《今日在何方》由于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故记忆犹深：“请你们不要问我今日在何方；难道你们能不来到这天安门广场？请你们不要再费心到这儿来找我，这里早已经是人的海洋。像四海惊涛齐奔向英雄碑下，像五洲风云齐飞向总理身旁。像无数白帆满载着圣洁的情感，我也扬帆催发呵，航行在这无边的海洋。”

为了把整个广场壮观的全景拍下来，我爬到国旗杆的高台上，慢慢旋转360度，用接拍的方式，连续拍了十几张，冲洗出照片后，剪去重复部分，然后粘成一幅360度全景图。1988年我在国家土地管理局工作时，单位举办摄影书法展，我的这张全景图受到了一致好评。这是后话。

4月4日晚，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憋了一肚子气的江青下令北京市立即把花圈撤到八宝山。5日清晨，群众发现不但花圈不见了，连夜里值班看守花圈的人也失踪了。这事件大大激怒了群众，进而爆发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民众抗议风暴。我妻子及时来电话把天安门发生的

事告诉了我。

◇ “四五”风暴

放下电话，我转身报告处里的同仁们：“天安门出事了，花圈都被撤了。几十万群众聚集在广场上，把警车都烧了。谁和我去天安门看看？”大家都想去，但没人敢响应，因为上面有规定。“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看怎么收场！”从大庆油田调来的张顺来了这么一句。他是我的铁杆同盟军，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冲着上面的。“上班时去，老太太马上就能查出来。”我的另一哥们刘宝隆提醒了我。他指的是政治部主任。她是我院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批邓很积极，对我们宣传处一直有看法。要不是申院长护着，我们处早就因抵制批邓挨整了。

显然大家有顾虑，毕竟上面已三令五申，还有个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但顾不上那么多了，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天安门。离下班还差一刻钟，我跑到传达室借了通用月票。那时我们这些小干部在市里出差，或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院里买了一二十张没照片的通用月票，谁都可以用。借到月票后，我窜上了开往天安门的公交车。上车才知道，市里通知所有的公交车都不许进内环路，最近只能到西单。在车上，人们都在议论天安门发生的事。

到西单下了车，买了几个包子，解决了肚子问题，然后步行去天安门。过了六部口，远远听到广场上大喇叭在反复播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讲话：“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这声音促使我加快了步伐。

四月初，夜幕来临的早，到天安门后，天色已昏暗。白天聚集的人多半都离开了，广场上也就有数千人，基本上都是像我这样闻讯而来的人。气氛的萧条令人有些失望，难道这场伟大的斗争就这样结束了吗？同时又为没能亲眼目睹白天群众抗争的场面而遗憾。观礼台边上有一群人在听一个青年介绍白天的情况，我便凑了过去。

那青年讲述了如下情况：

凌晨1—2时，大批军人、警察、民兵及200辆汽车开到广场，连拆带踩，广场上的花圈惨遭践踏和洗劫。他们将花圈强行运往八宝山烧毁，一小部分放到了中山公园内。当时在纪念碑前守卫花圈的人们和军人、警察发生了冲突，几十名看守花圈的群众也被带走了。

清晨6时多，许多早上来换班（看守花圈）的人发现花圈没了，看守花圈的人也没了，十分气愤，广场上聚的人越来越多。正在这时，北京市172中30名学生来送花圈，警察不让进。在广场上的群众把气撒在警察身上，和他们发生了激烈地辩论。在群众的支持下，学生们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

这时，有人跳出来攻击周总理，引发众怒。该人向人民大会堂逃去，群众跟着涌向大会堂东门，被解放军挡在大门外。集聚的群众已达十多万人，在大会堂门口高呼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派了一辆宣传车来到天安门广场，车上的大喇叭高声宣布：“清明节献花圈属于四旧，花圈已经被清理，请广大革命群众不要受坏人利用，尽快离开广场。”把为周总理献花圈说成“四旧”，惹怒了广场上的群众。他们把车拦住，砸扁了喇叭，推翻了车。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被群众团团围住，许多警察的帽子被摘下抛向空中。北京民兵指挥部调来一批

批民兵，来一批被瓦解一批，人心所向使民兵毫无战斗力，有的民兵还没到天安门广场就把身上的民兵标志偷偷摘掉了，混在群众中。这时，广场上已有几十万人。

有人高呼：“中山公园有花圈！”许多人冲进中山公园，搬出一些藏在中山公园里的花圈。又有人喊：“小灰楼（联合指挥部）里有花圈，人群又涌向小灰楼，包围得水泄不通。群众派出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谈判无结果。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警察、民兵 近千人，加强了小灰楼的警戒。

下午，愤怒的群众点燃了停在指挥部门前的四辆汽车。同时，部分群众冲入楼内，搜出了一些“黑材料”。有人点燃了“黑材料”，结果小灰楼也被点燃起火。指挥部人员从楼南面窗户爬出，撤离了小灰楼。

“小灰楼在哪儿？”我问那年青人。“就在那儿。”他用手指着广场的东南方向。天漆黑，根本看不见那个小楼，我这才发现广场的灯没亮，广播里还在播放吴德的讲话。突然，广场上的灯全亮了，我看见了小灰楼，但转瞬又都灭了。我以为是照明设备出了问题，没意识到这是在警告人们赶快离开。

我走到纪念碑前，光线暗的已什么都看不清，只有几十人借着微弱的月光抄贴在碑栏杆上的诗词。4日以前的诗词都被撕掉了，被抄的诗词全是当天新贴上去的。一首王立山写的诗贴在纪念碑显著位置上，有人把脸贴近高声朗读：“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诗后来被《人民日报》称为“反革命煽动”。

在前门大街的灯火辉映下，被《人民日报》称为“营房”的小楼前光线稍亮，能看清摆着几辆白天被烧的车，有轿车、面包车、吉普车。二楼两个窗户外墙有烟熏的痕迹，似乎在告诉人们：里面的房间曾着火。但很明显并没形成火灾，不像《人民日报》后来说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大约有一个连的解放军在那儿警戒。他们围成一圈，坐在被烧的车和小楼旁边，背对观众，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九点，我看到有民兵从中山公园出来，乘夜幕悄悄包围了天安门一侧。预感有情况要发生，我立刻从前门方向离开。这时我注意到前门通天安门的道路已被封锁，人们只准离开广场，不准再进入广场。我不由的回过头又看了看还在广场的人，心中暗暗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 腥风血雨

6日上午，我的小学同学来电话告我，5日夜晚在天安门实施了镇压，他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他说，5日天安门广场出事时，首都民兵指挥部曾从市区工厂调去上万民兵，但都被瓦解了。分析原因，一是广场人多，法难治众，民兵队伍被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二是市区工厂离天安门太近，各厂民兵都在议论着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有些人专程去天安门广场并随时传回广场动态。工人民兵了解真实情况，容易同情广场群众，形不成战斗力。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从郊区工厂调民兵，指定选白天在工厂一直上班的工人（怕上夜班的人白天去过天安门）。我同学所在厂在玉潭潭附近，被市里点名执行政治任务，他被选中。开始，只被告知“去执行任务”，“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等他们乘车进了中山公园，才发现那里已集中了大批民兵。

“联合指挥部”的一位领导对他们进行了动员，说：在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

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上午，他们制造事端、行凶作恶，冲击人民大会堂。他们围打警卫战士、消防队员、人民警察、首都工人民兵，烧毁了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和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的汽车。下午，这伙坏人又冲进“联合指挥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放火烧楼。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民兵同志们，要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动员完后，把早已准备好的镐把发给他们。有关负责人举着镐把讲：“清场时，不管男女老幼，一个也不能放走。如果有人反抗，就用这个打。”“往哪儿打？”他们厂里一个年青工人大声问道。“往死里打！”那个负责人恶狠狠地回答。一听这种情况，许多人尤其是女工，都没领“武器”。这时，我同学有些后悔，他星期日去过天安门广场，知道一些事实真相。他明白，镇压人民群众没有好下场。但现在一切都晚了，只能凭良心见机行事。接下来是吃晚饭。有关部门送来了肉包子，一边发包子，一边嚷嚷：“包子管够，吃饱了好战斗。”

晚上九点半，约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开始进入广场清场。最前面的是民兵，跟在后面的是警察。当包围圈形成后，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都打开，把广场照得雪亮。清场的队伍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棍棒，杀气腾腾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广场上当时约有近千人，几次往外冲都被棍棒打了回去。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包围圈的薄弱点，即女工集中的地方。女工大多赤手空拳，没拿棍棒，而且心慈手软。多数人硬是从女工集中的地方冲开缺口，消失在东交民巷的胡同里。大约有一二十人被女工身后的警察打倒，抓了起来。剩下的人纷纷退向烈士纪念碑。

当民兵、警察最后蜂拥而上抓捕他们时，凡是抗拒的，都被打得很惨。据我小学同学讲，他亲眼看见有四五个人最后被抬走时，头耷拉着，一动也不动，浑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有的人只是问了一句：“你们凭什么抓人？”或者说“我只是来看热闹的”，也会遭到毒打。工人民兵一般都下不去手，下手最狠的都是警察。有的一边打一边说：“打的就是你这种看热闹的。”一共抓捕了二百多人。

后来我听说，被抓的人中有我的中学同学孟连，他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曾给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家经委副主任薛暮桥当秘书。据他回忆，当他准备冲出包围圈时，警察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用棍棒狠狠地打他的头，从烈士纪念碑台阶下边一直打到台阶上边。十几个人围住他又踢又打，直打的他痛昏过去。待他慢慢清醒些时，发觉一个被打昏的人压在他腿上，胳膊旁边还躺着一个被打伤的人。纪念碑四周一片刽子手凶残的狂叫声和受害者凄厉的惨叫声、痛苦的呻吟声。孟连后来得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同学都认为，他的病同他当年头部受到猛烈打击有关。

“你知不知道抓的都是无辜者？白天闹事的在吴德讲话后都走了。晚上去的都是闻讯看热闹去的！”我在电话里冲我小学同学大声嚷嚷。“知道。不但我们这些小喽罗知道，我看上边也知道。抓的人都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今天一早就让单位来领人。如果认为他们有问题，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把人放了。”“既然如此，干吗还要如此兴师动众？”“不这样中央的面子往哪放？无产阶级的权威还要不要？白天脸都丢尽了，晚上得找回来。”“抓的人挨打了吗？”“态度好的都没挨打。但也折腾的够呛。所有被抓的人都在屋外面壁站着，不准动。后面就站着看守他们的人。谁乱动就用棒子打谁。上厕所也不允许。晚上看守他们的人都穿上军大衣了，这些人还不冻的够呛？！我听说有的人还尿了裤子。”“你没干缺德事吧？”“你还不了解我？我向你保证，我没打一个人。今天通知各单位领人，大多数单位还不错，马上就来了，还带着本单位人白天上班的证明。也有差劲的，不但不领人，还说什么此人一贯与领导作对，经常去天安门，留下来让公安部门好好教训教训。”

◇ 厄运临头

接到我同学的电话后，我心情沉重，但无法和任何人讲。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刚刚发出《紧急通知》：“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江青为镇压成功十分得意。张春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

但仍有群众不畏强暴，6日继续献花圈。有人在纪念碑栏杆上用笔写下：“敬爱的周总理，您的花圈在我们心里，谁也收不走！”“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聚集在天安门的群众，在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的倡议下，成立“全国保卫周总理委员会”。

4月7日，我妻子告我天安门广场戒严了，有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打扫“卫生”。我说：“他们是在清洗血迹，消灭罪证。”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文章说：“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种颠倒黑白的宣传令人气愤，在处里组织学习时，我再也抑制不住了，说：“这是歪曲事实，白天闹事的都走了，晚八点后在天安门全是路过的好奇群众，所谓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些无辜群众，他们成了替罪羊。”这么一讲，暴露了我自己5日晚去天安门的事，因此被上报了石油化工部。

紧接着，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清查反革命运动”，即追查“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作者”的所谓“双追”。各单位都成立了“双追”办公室，纷纷开大会、小会，动员人们交待、揭发、检举，要求每个人将清明节期间的活动交待清楚。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恶狠狠地说：“要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注意选择年龄大的要杀。”

没过几天，公安局就把我们规划院机械厂贴标语的那几个青年人逮捕了，我因曾为他们辩护而陷于被动。院保卫处在追查所谓《总理遗言》传入我院的源头时，又追到我头上。没想到，当时追在我后面苦苦求着想看材料的人，一遇风吹草动就把我给检举了。保卫处找我谈话，我承认是我从天安门抄录并传给别人的。但我辩解说不知是假的。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当我“四面楚歌”时，又有人落井下石，把我抵制批邓的言行揭发出来。

毛泽东在1974年下半年至1975年初先后作过三条指示：其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其二，希望社会安定。其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灵活利用这三条指示，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以此为整顿和发展经济开路，并以中央文件下发。下发的文件中

还特别注明“毛泽东圈阅”。

但后来开始“批邓”，传达毛主席的话：“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御用班子梁效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在学习梁效的文章时，我向政治部领导提出两个“不理解”：第一，把主席的指示作为纲领，其中排首位的是“反修防修”，怎么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第二，既然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又怎么理解当时毛主席的“圈阅”及下发？主席的意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是“不同意”，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过去和今后主席“圈阅”下发的中央文件？当时很多人附和我的疑问，领导也没说我的疑问有问题。但形势一紧张，就都成了政治问题。

另外，我们主任对我最恼火的是我竟然敢抵制“批邓”。主任让宣传处组织研究室的支部书记办“批邓”学习班。我们处长有想法，但又不能不执行领导指示，就把我推到了前台。在学习班里，我变换方法，只组织学毛著，不学报上批邓文章；只谈学习体会乃至聊大天，不开批判会，使大家避免去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三天的学习班成了个形式。支部书记心领神会，学习班结束后，纷纷下到各油田出差，结果全院的“批邓”运动始终没能开展起来。

这几个问题合在一起，我就成了规划研究院的重点人物。尽管申院长想保我，但在那个形势下，他也受到很大压力。政治部主任为抓出我这个邓小平的“徒子徒孙”，指示保卫处把我的材料上报石油化工部。但那时全国的清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大多数单位的领导们本身就是那次事件的参与者，与广大群众的情感是一样的。他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护本单位参与事件的职工，不少单位对上面下达的清查工作顶着不办。原石油部的老领导余秋里、康世恩都是紧跟邓小平参与整顿的，是“四人帮”的眼中钉。余秋里对我送给他周总理照片一事印象深刻。部领导对我采取了保护态度，只是通知我父亲：“不要让你儿子给你惹麻烦。”部领导打招呼后，我知道院政治部主任把我告了。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我心情能好吗？后来主任指示宣传处，让我下到机械厂蹲点。

“四人帮”一倒台，我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77年石油化工系统开展路线对比、控诉“四人帮”罪行的活动中，我被定为反对“四人帮”、抵制“批邓”的代表。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筹组大会秘书处时，抽调人员的条件是反对“四人帮”、抵制“批邓”。石化系统的两个名额，一个是在各单位推荐的基础上选定的，另一位是我，是部里指定的。那个主任在通知我去报到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推荐的是保卫处长，没想到部里点名让你去。”应该说她没料到的是，当年她向上级报送我的“黑材料”，变成了过硬的“红材料”。还用推荐吗？

◇ 狱中斗争

说到石油机械厂贴标语而被捕的那几个青年人，他们的经历十分悲惨。出狱后，他们曾在全院大会上对“四人帮”的法西斯暴行进行了控诉：

被抓进去后，首先要挨一顿毒打。带进的房间里站着四个警察，其中一个问：“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不知道。”他一拳就把年青人打倒在地。接着被另一个警察提起来，再问同样的问题。如果态度强硬，就会遭到轮番的毒打，直到挺不住了，说：“知道，我是现行反革命。”警察才住手。此后就一直关着，再没人过问他们。

当时抓人很多，监狱人满为患，还临时借用了部队营房的地下室作临时牢房。一个二十平米的房间要关二十多人，人均不到一平米，只能坐着，无法躺下睡觉。监狱方对这批“政治犯”千方百计折磨。每人每天只给一茶缸水，干渴难耐。有一个中学生抓进去后被打疯了，因流血过多口渴，向同屋的人苦苦哀求要水喝。有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想把自己的水让给他。狱警大声警告：“谁给他水喝，就断谁的水！”。那个中学生最后渴的抱起屋中间的尿桶大口大口地喝尿，目睹此景的人无不掉下眼泪。

天气越来越热，在如此拥挤的情况下，其生存状况可想而知。而狱警偏偏把屋顶上的小窗户全部钉死。他们实在忍无可忍，齐声呼口号抗议：“要热死人了！打开窗户！打开窗户！”“我们要求放风！我们要求放风！”有的青年高声质问：“国民党的监狱都放风，你们为什么不让放风？！”他们这一喊，引起了连锁反应，各牢房的喊声此起彼伏。十几个狱警气急败坏地冲进他们牢房，把喊得最凶的几个人抓了出去，一边勒令他们穿上棉衣，一边恶狠狠地说：“看你们谁还说热！”对不服从的，则拿棍棒往死里打，直到穿上棉衣为止。结果好几个穿棉衣的都热休克了。

许多关入牢房的人都很悲观，认为中央文革绝不会放过他们这批“政治犯”，虽然案子一直没有宣判，但从广播中听到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大家普遍认为前途凶多吉少。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消息传到监狱，大家哭成一片。主席健在时，还能镇得住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现在总理、朱老总和主席相继去世，小平被打倒，真不知江青等人上台会不会对他们大开杀戒。没想到的是“四人帮”很快倒台了。

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前辈和汪东兴的支持下，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全国上下举国欢腾。监狱里的“政治犯”在中央电视台正式公布这条消息时才知道的。同往常一样，晚上七点，监狱安排他们看新闻联播，接受形势教育。当中央电视台播出“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时，不但被押人员震惊，连狱警也毫无思想准备，措手不及。所有的“政治犯”心情激动无比，大家手挽手地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苦难的日子到头了，他们觉得自己有救了，中国有救了，中国人民有救了。没人理会狱警的命令、狂吼甚至殴打。就这样他们唱了一个多钟头，直到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赶到。

“四人帮”倒台后，这批天安门的“政治犯”并没因反对过“四人帮”而被立即释放。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时代，“四五运动”还没平反，“文化大革命”还没被否定。公安部门给这批人又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押着不放。我们主任还把海淀区公安局的负责人请来，向全院及机械厂的职工宣布这几个年青人“新的罪行”。

八个月后，警方通知我院政治部把这几个青年人领回去。警察在最后的训话中警告说：“这里（指监狱）的情况不能对任何人讲。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管谁上台，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可以把你们放回去，也可以把你们再抓回来。”但是，机械厂决定用欢迎英雄的方式向专政机关表达人们的抗议。厂政治处主任亲自带队，卡车上插着红旗，贴着“欢迎反四人帮的英雄归来”等标语，敲锣打鼓去监狱接人，让他们作为英雄昂首挺胸地凯旋归来。

◇ 平反后的思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给“四五运动”平反。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

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且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四五运动”的爆发绝非偶然。它是林彪事件以来，人民群众对极左思潮多年观察反省的结果。这场运动，集中地表现出人民群众对极左思潮的代表者——江青集团的痛恨，同时也蕴涵着对“文革”对毛泽东晚年所作所为的不满。这场运动的另一亮点，是表现出人民群众对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者——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怀念和呼唤。

这场运动从表面上看是悼念周恩来。实际上是建国27年来，最大的一次不受毛泽东领导的自发的反对运动。当民间怨声载道，民意又能以适当的形式形成巨大声势时，就促进了领导集团高层的分化，推动一些人顺应民意，发动变革。“四五运动”为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打下了基础。邓小平曾说：“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平反“四五运动”，也同时推翻了某些领导人一贯的论调，即纠正过去的政治定论会导致社会动乱，使民心不稳。给“四五运动”平反的结果证明，新的领导人拨乱反正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就缓和了社会的矛盾，使人民恢复了对执政党的信心。同时人民的思想解放了，积极性焕发了，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创造出稳定的发展环境。

~~~~~

## 【史海钩沉】

###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

• 霞 飞 •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远去，人们对那个时期的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了，但有三个字，大家很难忘记，这就是“斗、批、改”。这三个字，是当时毛泽东计划搞“文化大革命”的三个阶段。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就是斗、批、改的过程。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设想，是由地方造中央的反。不久，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形成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主观愿望是为了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他当时对中国政治形势做出了这样的估计：许多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甚至中央也出了修正主义，而中央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对此，毛泽东十分忧虑，认为搞掉中国的修正主义，是他的责任。1965年初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怎样才能搞掉中国的修正主义呢？毛泽东通过一段时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验，认为光靠一般的党内斗争，光靠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被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才能保证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不改变颜色。

◇ 怎样自下而上地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呢？毛泽东先是设想由地方造中央的反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开的大区书记会上谈到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应该造中央反的问题。他说：“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两天后，也就是10月12日，毛泽东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当时，他还说了这样一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待？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虽然毛泽东多次同地方领导人谈到地方造中央的反的问题，地方的领导干部们始终没有反应。大家对毛泽东所讲的地方造中央的反的问题很不理解，不明白毛泽东所指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是怎么回事，更不清楚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是谁？还有哪些人？非要通过造反，才能搞掉修正主义吗？

对于地方领导干部的这种消极反应，毛泽东也感觉到了。1966年1月，他对陶铸、王任重等人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

既然要让地方造中央的反，那么，怎样才能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呢？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经过了长时间的思索，两种想法在他的头脑中交替出现：

一种是通过党内斗争来搞掉修正主义者。他在1966年3月就向各大区领导人提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毛泽东的意见很明确：要各大区党的领导人亲自抓阶级斗争。4月22日，他又说：“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全面系统地抓”，就是让各级党委全面系统地抓。直到1966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笔者注）亲笔写的文字中，仍然有通过党的领导来搞掉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想法。他在提到各界各领域里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说：我们要“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话说明：毛泽东当时确实还有通过党的领导来“清洗”、“调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打算。

另一种想法就是通过发动青年学生造修正主义的反。他在1966年3月说：“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毛泽东还提出了各地要出“孙悟空”的概念，提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概念。这也是他在1966年3月提出的。3月31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中责问：你们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张春桥立即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报告。毛泽东听后生气地反过来责问中宣部：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说这些话，反映了他的另一个想法：要支持类似姚文元那样的青年人自下而上地造反，下级不必向上级打招呼，即不必通过党的层层领导，要支持“小鬼”，打倒“阎王”，地方要出“孙悟空”。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毛泽东的后一个想法占了上风。这是与他的一个严重估计联系在一起的。从1966年4月到5月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估计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认定中央修正主义势力已经很大。他在4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就说：吴晗“朝里有人”，“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得很广泛，朝里有人”。“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1966年5月5日，他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由于有这样一种估计，他下了这样的决心：“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对于整资产阶级复辟的办法，他此时也已经决定：要自下而上发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毛泽东认为，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然会受到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和镇压。他当时认定，在中央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各大专学校派工作组，支持各学校的领导开展工作，就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镇压群众造反的体现。一边要造反，一边要镇压，就必然会出现“天下大乱”的情况。当时，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乱”的征兆。西安交通大学发生了“六·六事件”，南京大学发生了所谓“匡亚明压制革命”事件，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天下大乱”的表现。

如何看待“乱”？毛泽东认为，乱得好，乱，是乱了敌人，即乱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阵脚，因此，他对这种乱是高兴的。由这种认识，毛泽东形成了搞“文化大革命”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这一思路，从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集中表达出来：“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至此，毛泽东形成了搞“文化大革命”要经过由乱到治的过程的思路。

按毛泽东的想法，由“乱”到“治”有一个过程，把这个过程简要概括起来，就是“一斗二改”。

毛泽东认为，搞“文化大革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一开始，毛泽东对这个全过程，并没有形成“斗批改”的概念，而是形成了“斗”和“改”的概念。1966年7月24日，他首次讲了这个思路。他说：“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他批评中央派的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一斗二改，凡阻碍运动者，统统驱逐之”。毛泽东的这些话，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他搞“文化大革命”要经过“一斗二改”阶段的思路。

什么叫“斗”？毛泽东认为，“斗”，就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毛泽东认为“斗”和“批”是一个概念，他说：“学校里的斗争，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斗的同时，就是批判，开展斗争和批判，要发动群众，而斗争和批判的矛头是对上的。这是与他对包括部分中央机关在内的许多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对于斗争和批判的对象，群众最清楚。他质问道：对于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

的问题”。“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群众最懂得”。“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斗和批，实质上还是斗，批只是斗的附属物，实际上包含在批的里面。

“斗”的实际内容，就是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走资派。“斗”，要发动和依靠群众。他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对于群众，“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我们要选择实行群众路线。斗，就不要怕乱，要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在斗的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斗，就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去掉怕字”。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只有通过“斗”，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因此，“斗”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是关键的阶段。

至于“改”，毛泽东到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才提出来。这次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指出：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所说的“改”里面的这些内容，关键在于“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 ◇ 从“一斗二改”到“斗批改”

随着“文化大革命”地开展，毛泽东关于搞“文化大革命”必须经过“一斗二改”的思路，又有所改变，他把“批”当作“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形成了“文化大革命”须经过“斗、批、改”三个阶段的思路。

“十六条”把“批”，从“斗”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强调：“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十六条中所说的“批”，并不是单独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阶段的“批”，它只是把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批“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区别开了。“斗”是对当权派，“批”是对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思想。

1966年8月28日，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概念。当天，他在同刚去《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时说：“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这些话，既表明了他对造反的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过火行为的担心，又表明了他还要继续支持学生造反的意向。他的意思，是要把造反的学生引导到他所设想的“一斗二批三改”的路子上来。但是，此时毛泽东的“斗”和“改”之间所加的“批”，仍然不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阶段来设想的，而只是把当权派与学术权威区分开来的一种设想。

真正把“批”作为一个阶段，是从1966年10月开始的，其标志是10月2日《人民日报》提前发表的《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这篇社论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作能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三个阶段联系起来的关键。社论说：“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

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为什么这个时候把“批”单独列出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阶段呢？这与当时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斗争性质的认定有关。他此时已经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路线斗争。既然是路线斗争，那么，决定“文化大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决定，先在中央集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展开“文化大革命”的“批”这一阶段。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核心内容是陈伯达代表中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主题报告。报告中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这个报告中还直接把这个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称之为刘、邓路线，他说：“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

10月25日，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认定刘少奇、邓小平是犯了路线错误。当时，毛泽东是从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角度说这个话的，他说：“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点，转向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认为，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批”的阶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斗”的阶段结束。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继续受到冲击，而且，在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上，受到冲击的面更大了，受批判的对象，从大学的教师，到中学的教师，甚至小学的教师，批判的内容也失去了控制，甚至穿花衣服、看旧书，都成了受批判的口实。当然，在中央，批判的重点，还是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持续十年的大动乱中，“批”一直持续下来，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则是“改”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标志。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转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这一阶段同时伴随着“斗”，全国进入了更加动乱的状态。

本来，毛泽东是想在1967年完成斗、批、改三个阶段，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这从毛泽东当时所说的搞“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收场的话中可以反映出来，从1967年元旦社论中也反映了出来。这篇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所谓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实际上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可以结束了，至少是可以收尾了。

但是，形势的发展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1967年、1968年全国反而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先是发生了上海的一月夺权事件，接着各地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夺权事件。毛泽东对这种由造反派自下而上的夺权，是持支持态度的，他还曾经设想，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也是他关于“改”的初步打算。这个打算，他在1967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过流露，他把从夺权到“改”这一过



程，形容为“打江山”。他说：“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毛泽东预想的由群众造反，打倒走资派，夺了走资派的权力后，再搞选举，选出优秀人物组成领导班子，重新建立政权结构的路子走，而是很快就出现了各造反派之间的相互斗争，直至发生武斗。在1967年初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派系林立、派仗不断、社会秩序失控、许多厂矿停产、流血事情不断发生的“大乱”的严重情况，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他原来的想法，不得不派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对许多地方和要害部门实行军管。

但是，军管并没有结束打派仗的局面，反而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军队和一部分造反派之间矛盾的发生（1967年的“7·20事件”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以军队干部为核心组成各级领导班子，使权力集中在军代表手里；实行军管的军代表不熟悉业务，不能很好地指挥生产和各项社会工作而带来新的混乱，等等。但此时，毛泽东只有依靠军队来稳定局势了，正如他在1967年7月14日同杨成武等人谈话时所说的：“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军管，以军队代表为核心的各级领导班子组成了，军代表也熟悉了一些地方工作，局势才稍稍平稳了一些。

此时，毛泽东开始考虑“改”的问题了。实际上，从上海一月夺权开始，他就考虑了“改”的问题。当时他考虑的重点，是建立“革命委员会”。他是按照“三结合”的思路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所谓“三结合”，就是建立军代表、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毛泽东把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事情看得很重，既把它看作是稳定局势的关键，又把它看作“改”的一个重要步骤。他通过观察和认真思考，形成了一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基本想法。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题为《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在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之下，各地加快了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进程。至1968年9月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止，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 ◇ 全面铺开的“改”以及斗批改的最后结局

毛泽东认为，各地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他预想的“文化大革命”中“改”的基本任务的完成。但他又认为，“改”还有不少工作，需要继续去做，“改”要全面铺开。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体现了出来。

九大政治报告，把突出阶级斗争的“党的基本路线”，作为贯穿整个斗批改全过程的任务。此后，“改”就全面铺开了。工厂、企业打破旧的规章制度，建立所谓的工人民主管理制度（实际上是由造反派操纵的假民主管理）；农村则收回自留地，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学校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党政机关实行精简，同时把大批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这些“改”法，打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行各业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改”的过程，伴随着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权力分配中的争夺。这种争夺，在党的九大上就开始了。九大之后，1970年8月底9月初又发生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随后，在全国展开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1971年9月13日，又发生了林彪事件。之后，又接连开展了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等运动。总之，运动一个接一个。在这些运动中，毛泽东非常想通过努力，把社会稳定下来，但他又要维护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种两相矛盾的做法，当然不能真正完成毛泽东所设想

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三个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就是在这种矛盾状态下，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从此，斗、批、改也就被封存在历史当中了。

□ 党史纵览 2004. 12

~~~~~

【史实澄清】

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非“四人帮”授意之作

• 王忠人 • 江燕 •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正是发表在毛主席逝世不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它为“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大造舆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华国锋、叶剑英等认为“这是‘四人帮’准备实施反革命行动的一个信号”。在《永》文发表的第三天——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一网打尽。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壮举，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索地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的前途命运。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立即派以刘西尧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审查历时两年多，结论如何？《光明日报》的同志知道，新闻界一部分同仁也大致知道，至于社会上对这个问题则知之甚少，甚至有些误传，因此本文拟就《永》文发表过程及对莫艾审查情况作一介绍。

◇ “四人帮”是如何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

1976年，毛主席从9月初开始，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主席逝世后，政治局在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追悼大会上华国锋的《致悼词》稿时，“四人帮”参加了讨论，他们都没有提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上写进“按既定方针办”；然而他们却有计划有预谋地在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偷偷塞进一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社论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篇社论，是“四人帮”文痞姚文元直接筹划的，经过“四人帮”一伙审看了。正式发表以前，又在他们圈内和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中散发，以便造成一种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是有一个临终遗嘱，而且是向他们说的。他们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

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姚文元遵照江青的旨意，于9月17日、19日、20日、23日，先后四次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如9月17日电话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电话指示：“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这里需要解释几句，姚文元为什么那么突出“按既定方针办”，而怠慢“三要三不要”呢？所谓“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时说的。毛主席在讲完“三要三不要”后，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华国锋在致悼词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实际上就是对“四人帮”的一次严正警告，“四人帮”当然不愿宣传针对他们的话。

在姚文元的再三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几家报刊就登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在上海，舆论攻势更是咄咄逼人。《文汇报》9月21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本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一时间，气氛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 华国锋戳穿“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阴谋

毛主席逝世后20多天，“四人帮”桩桩丑恶表演，华国锋看得清清楚楚。同这伙野心家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决心与叶帅等老同志一起，揭露他们的阴谋活动。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上午，华国锋一走进办公室，秘书把要批阅的文件交给他，头一件是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审阅稿。这是急件，需要马上处理。当华国锋读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他停下来了，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划了一个大问号。联想最近各报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他再也不能容忍江青、张春桥这帮野心家继续以毛主席指示卫道士的身份招摇撞骗了。此前他问过许多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工作在主席身旁的同志，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现在他手中有毛主席给他写的三句话，（即“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他要用此来揭穿“四人帮”伪造的“临终嘱咐”。于是华国锋在这份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然后华国锋向秘书交代，“此件交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外

交部。”文件传到张春桥手里，这个阴谋家意识到华国锋的批示不简单，它说明华国锋、叶剑英开始向他们发难了。于是他在文件上写道：“此件暂不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关于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照过去方针办”的手迹，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4月30日晚，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同会见。会见完毕，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在谈到全国形势时，华国锋对一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毛主席看出华国锋的思想，因为他在4月7日才担任国务院总理，时间不到一个月。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把邓小平搞下台，局势非常不稳，工作有许多困难，所以毛主席为了鼓励他，给他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后来，华国锋向政治局传达时，公布了前两条，最后这句“你办事，我放心”，他保留了下来。毛主席写的这几句话，是工作中正常的交谈，这怎能叫临终嘱咐呢？

华国锋的批示，在“四人帮”中引起震动，于是，姚文元在10月3日下午，亲自找《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姚文元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10月4日晚，鲁瑛电话通知莫艾去《人民日报》，鲁瑛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没有任何表示，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莫艾回到报社以后照鲁瑛的话办了。

◇ 《永》文的选题、组稿、和定稿过程

选题的产生1976年9月15日，莫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守灵。在休息厅里，《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是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去取清样。”过了半小时，有人给鲁瑛送来一大卷清样，鲁瑛便给在场的十来个人分发了。这就是9月16日要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清样，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莫艾当晚回报社后，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鲁瑛同他的谈话，并组织大家学习这篇社论。莫艾根据社论内容，结合宣传报道，又谈了一些报道选题设想，其中就有“按既定方针办”这个题目。他指示到有关单位组稿。第二天下午，领导小组分管业务的几个成员和总编室同志一起研究选题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相当于今天的编委委员或副总编辑）孙关龙提出到“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约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大家同意派孙关龙向“梁效”组稿。孙关龙提出再派一名同志同他一起去，于是又确定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与孙关龙一起组稿。

由此可见，《永》文选题的产生，是为了贯彻9.16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莫艾在领导小组会上谈学习社论体会时，就提出要结合宣传报道组织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到“梁效”组稿9月17日上午，孙关龙等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去“梁效”组稿，二人在汽车里讨论，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题目？商议结果，题目就定为“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到“梁效”谈了组稿意图后，“梁效”核心组随即按报社意图将这一任务交给“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当天下午，“梁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约定9月20日由范达人来报社谈写作提纲。当晚孙关龙把去“梁效”组稿情况和“梁效”20日来报社谈写作提纲一事向莫艾作了汇报，莫艾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孙关龙，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再同“梁效”谈。

9月20日上午，“梁效”写作组范达人等人来《光明日报》，孙关龙等二位领导小组成员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谈了文章的写法与要求。孙关龙作了主要发言，大意是说，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是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意义，既谈现实意义，也谈历史意义；可以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再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文章要强调在国内要继续批邓，在国际上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树立必胜信念。

由此可见，《永》文并非“梁效”主动来稿，而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亲自向“梁效”组织来的；文章的框架和内容，也基本上是两位领导小组成员规划的。

修改与定稿在《光明日报》明确了文章写法后，“梁效”写作组长范达人将执笔任务交给写作组的一个成员。初稿写完，范达人作了润色修改，9月24日送《光明日报》。孙关龙接到稿件后，于当天夜里发排。9月25日打出小样8份，分送“梁效”写作组和莫艾等报社领导小组成员。9月27日，“梁效”将清样呈送给迟群、谢静宜。上写：“迟群、静宜同志：这是《光明日报》约稿，争取近期发表。此文是范达人、XXX、XXX同志写的，请您审阅。——两校大批判组，9月27日。”

清样在《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中传阅，有的同志提出过修改意见，如建议增加“三要三不要”的内容等，但没有被采纳。

9月29日，孙关龙将综合清样交给莫艾，莫艾于当天深夜阅处，改动了几处，签了字写了一段话：“我略有改动，请和‘梁效’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见报。”

9月30日上午，孙关龙同范达人在电话中交换各自改动的情况。9月30日下午，迟群给“梁效”核心组成员回电话：“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注：包括《永》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孙关龙把“梁效”的改动告诉了莫艾，莫艾同意。于是孙关龙在定稿样上写了批语：“这是‘梁效’与莫艾同志定稿，上一版头条，望早日刊用。”10月4日，《永》文便发表出来。

由此可见，《永》文初稿是9月24日写出，9月30日定稿。定稿时间是在华国锋10月2日戳穿伪造阴谋的前3天。这就排除了《永》文是“四人帮”针对华国锋批示而授意写作和发表的问题。

◇ 《永》文刊出后莫艾等人遭受审查

1976年10月18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莫艾隔离审查。1978年12月16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隔离，结束审查。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莫艾审查做出结论，结论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

对莫艾的审查结论，基本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受“四人帮”的指使或授意。从前面介绍《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看，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文章的命题、内容，也基本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审查结论说：“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

根据这个结论，在审查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文章曾不点名地给

莫艾冠以“四人帮亲信”、“四人帮骨干分子”以及“喽罗”等不实之词，自然应予推倒。

今天重提这个结论，很有必要，因为新闻界，尤其是社会上对莫艾的审查结果到底如何，很多人不了解。当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不点名地给莫艾加上的罪名，亦未见有文章澄清。这一点，看来是有疏漏的。

2、莫艾在主持《光明日报》工作期间，在宣传报道方面是犯有错误的。除了发表《永》文以外，还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以“梁效”、“高路”、“柏青”等笔名写的文章30来篇。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批林批孔”、“反对经验主义”、“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宣传栏目中，它们除了宣传极“左”理论，还影射攻击当时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孔丘之忧》、《宋江一上山，就……》等，因此，在莫艾审查结论上写有如下一段话：

“从1974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这段时间，《光明日报》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发表了许多错误文章，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莫艾同志当时身为《光明日报》主要负责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结论中所指的错误文章，都是自投稿，都是《光明日报》自己可以决定是否采用的稿件，而不是上面指定必须发表的稿件。如果总编辑头脑清醒，多一点独立思考，他就完全可以不那样积极发表那么多这类稿件。

3、结论中的处理意见是不予处分。既然莫艾犯有如上错误，为什么不予处分呢？结论说：“考虑到莫艾同志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公开宣传报道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左’倾错误影响发生的。因此决定：不予处分。”

结论的这段话是把莫艾的错误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审视的。一张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党要求它的宣传，必须严格贯彻党的宣传路线和方针政策。当领导这张报纸的中央领导人是坏人，是反党阴谋家，而且在舆论上极力推行他们的主张时，则被领导的报纸是很难不在版面上有所反映的。莫艾在《光明日报》的三年，正是党中央的宣传大权掌握在“四人帮”姚文元手里的时候，报纸宣传报道中犯有“左”的错误，应该说是有可原谅的一面的。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莫艾同志对待组织审查，态度是诚恳的，认真的。不予处分的结论也包含这个因素，虽然结论的文字没有这方面的表述。当中央工作组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后，莫艾就把自己在《光明日报》三年的工作记录、电话记录、来往信件和《永》文几次审稿大样等毫无保留地上交工作组。莫艾说这次教训“将永远镂刻在自己的骸骨上”，要求党严厉处分自己，并希望党组织把他“作一只麻雀，进行具体解剖，看看像他这样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是怎样滑到泥潭的？”“五脏肝胆，任党检查”，态度诚恳。在被审查期间，莫艾共写出160多份交代检查材料，还写出6000字的《三年错误总检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几个方面，深挖自己错误的根源。

对莫艾审查结论做出后，关于《永》文是“反革命夺权信号”的提法问题自然也不再存在了。

但是，经过审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帮”授意发表的问题，既然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没有阴谋关系，这样，所谓“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提法，似乎已不合适。事实上，近十年来有些比较权威的书刊已经不这样提了。比如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和200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在叙述粉

碎“四人帮”过程时，都没有提到《永》文，更没有说它是“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的话。

莫艾于1983年离休，由于他工作勤奋，思想作风正派，报社职工都很尊重他。近几年他身体多病，长期住医院。鉴于莫艾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报道了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对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表扬；建国以后，他担任了几个省市的新华分社社长，对党的新闻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1992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表彰他所作的贡献。这说明，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因为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期宣传报道上所犯的错误而影响对他全部新闻工作历史的评价。

孙关龙，当年是报社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同志。他在“文革”前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组织部，“文革”中下放工厂锻炼，1974年调到光明日报社，1976年3月升任报社领导小组成员。在审查《永》文发表过程时，孙亦被隔离审查。查清问题后，报社对他未予处分，继续让他在《光明日报》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后经本人要求，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专家。

范达人，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二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979年后仍在北大继续任教和从事比较史学研究，1989年去美国，1999年在香港出版《“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一书。

□ 《党史文苑》 2003年3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